

敦煌文史资料

第五期

政协敦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敦煌文史资料

第五期

政协敦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目

录

敦煌莫高窟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	李正宇
历史文化名城敦煌的由来·····	阎国权
从敦煌艺术研究所到敦煌研究院·····	冯志文
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纪实·····	王进玉
胡乔木同志夏日访敦煌·····	李成寿
敦煌婚礼话旧俗·····	张友仁
敦煌怀古·····	杨巨川
敦煌民间食俗浅谈·····	张友仁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访问敦煌·····	李世成
贺“敦煌文史资料选辑”出版·····	郭占法

敦煌莫高窟土地庙遗书的发现、

特点和入藏年代

李正宇

内容提要：1944年8月30、31日，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发现一批藏经，本文对这一发现的经过、藏品的内容、数量和时代特点一一加以介绍，认定这批藏品与藏经洞无关，并且对这批遗书的入藏年代进行了推断。

敦煌莫高窟批量出土古代遗书，有案可稽的先后有两次。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是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藏经洞（十七号窟）发现的，总数是四万余卷。第二次是1944年8月30日和31日，从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数量很小，总数有85件和32张残片，称为土地庙遗书。

除上述两次批量出土物外，还有几次零星出土，数量更少，每次不过三两件。如1942年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北数沙堆中发现的《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张君义等告身》；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姜占彪在元代残塑头内发现的西夏文写经一部；1965年秋敦煌文物研究所在122窟窟前遗址发掘出土的《天宝七载过所》及《领物残账》等。

藏经洞出土遗书，早已轰动海内，蜚声世界。中外学者对藏经洞封闭年代，封藏原因，遗书性质、内容、发现及流散情况等多有论述。

而对土地庙遗书及其他零星发现则缺乏探讨。本文对土地庙藏经发现经过、藏品的内容和时代特点加以介绍。并对这批藏品的来源归属问题试作探讨，为国内外敦煌遗书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一、土地庙藏经的发现与清点情况

1944年7月初，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准备拆除中寺后园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月30日上午11时许，本所职工奚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将其持送到所长常书鸿办公室。常所长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4时本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秀芝、邵芳、苏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会同西北考察团考古组成员向达、夏鼐、阎文儒共同检验，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8月31日，奚占彪又持来写经一包，云系本所临时雇员泥瓦工马志华、秦志和将另两尊残塑打破，从中所获而私藏于本所外面土坯夹缝中者。

两日来，从五尊残塑中所获经卷，经过清点，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编为61个目录号。孝经2件一个编号，诗经、记账单、北朝幢幡花名册、抄经起讫记录单等各一件，各占一个编号。此外，尚有写卷碎片32片，分做两包，各占一个编号，由苏莹辉整理编目。同年9月1日，所长常书鸿写出检验报告，对此事原委作了简要说明

①。1945年，苏莹辉撰文并将整理目录一并发表，连载在1945

年4月和5月国立西北图书馆主编的《西北文化》第23、25两期。

解放后，1951年8月，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本所研究人员刘忠贵、施懿婷将本所收藏的部分敦煌遗书加以整理编目，写成《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

“目录”以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的名义予以公布，刊载于《文物资料丛刊》（1），其中包括土地庙遗书。这部分遗书目录，经过刘、施二位重新审定，纠正了苏先生某些定名不当之处并加必要的说明。在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入于上述“目录”之中，除残片未计外，注明为土地庙出土写卷共78件。根据说明可知，其中0013、0014、0015为《法华》同一写本之断裂件；0025、0026为《大智度论》同一写卷之断裂件；0027、0028为《优婆塞戒经》同一写本之断裂件；0018、0050为《佛说阿难律经》同一写本之断裂件；0043、0067为《维摩诘经疏解》同一写本之断裂件；以此计之，土地庙出土遗书现存于敦煌文物研究所者，实为67件。解放前，苏先生所编目录之第十一号《诗经残卷》，1951年在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携至北京，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故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目录未予收录。

三、土地庙藏经与藏经洞藏品并无关系

土地庙藏经出土之初，人们没有注意思考它同藏经洞藏品的关系。六年之后，到了1951年，人们才关注此事。但却同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周文儒先生说：“1944年8月30日，我们在莫高窟住的时

候，国立敦煌文物研究所（按：应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因建职工宿舍，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像内，发现了六朝残经六十七卷，残片一包（按：此数比苏莹辉先生编制的目录少 18 卷并残片一包，乃次日发现者未计入内之故）……这像是王道士所造的，在塑像时为修功德，他持许多石室中的卷子，缠在像的中心柱内。在百劫之余，又出现于人世’，（《莫高窟与敦煌》，见于 1951 年 5 月北京学习书店编《敦煌》一书 33 页）。傅振伦先生在《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一文中，也讲了同样的意见：“1943 年 4 月至 1948 年 7 月（按：此一期限的提法未知所据），还在清末王道士所造的泥塑佛像身中，发现了 69 卷的写经”（见《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四期，1951 年 4 月）。傅先生所记卷数，又比阎文儒先生所记多出 2 卷，但阎、傅两位先生相同的一点是，都认为经卷所出之残塑像系王道士所造，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土地庙藏经原为藏经洞旧物。

同阎、傅之说相反，宿白先生同时提出了另一说法，宿白先生在《莫高窟大事年表》中写道：“1945 年，民国三十四年敦煌艺术研究所修建宿舍时，在道光年间所塑的佛像腹中，发现六朝写经六十八种”（见《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五期，1951 年 5 月 31 日），后来傅振伦先生修改了他 1951 年的说法，他在 1983 年提交全国首次敦煌学术讨论会的文章《敦煌莫高窟学术编年》中写道：敦煌莫高窟“在道光年间所塑造的佛像腹中，发现六朝写经“六十八种”，时间也同宿白先生同样误系在 1945 年。宿、傅两位先生说土地庙残

塑为道光年间所造，那时，王道士还没到莫高窟，藏经洞尚未发现。这就意味着土地庙藏经与王道士以及藏经洞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两种说法，三十年来莫衷一是。敦煌学者或从阎、傅先生之说，或同宿白先生之说，大家都未曾对此展开过讨论。

去年八月间，笔者访问了土地庙遗书出土时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打破残塑、发现遗书的奚占彪先生（已退休，住莫高窟），另一位是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现为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奚占彪先生认真忆述了遗书出土的详细经过，即本文开头所介绍的情况。他告诉笔者，他所当年上寺主持喇嘛易昌恕和中寺主持杨和尚说，他们的师祖师父讲，土地庙的五尊塑像，原在今莫高窟画店西侧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庙里，此庙年久倾圮，清代修建中寺才把那五尊塑像搬到中寺后园，另建土地庙予以安置供养。

常书鸿先生告诉笔者，他所易喇嘛说土地庙是道光十七年修建的。

参酌奚、常二位先生转述的口碑资料，我们大概知道，土地庙建于道光间，而土地庙中的五尊残塑，则是从别处搬来的，其塑造的时间又当在道光十七年之前很久。

易喇嘛于1961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十八岁时来到莫高窟当小喇嘛，推其时为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藏经洞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土地庙及其塑像若系王道士所修，并藏纳经卷于塑像腹中，又必在光绪二十六年之后。易喇嘛光绪十一年十八岁时到莫

高窟，光绪二十六年他三十三岁，住在莫高窟已经十五年，土地庙及五尊塑像是否为王道士所修，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是十分可靠的见证人。他和杨和尚都说土地庙及塑像与王道士无关，是根据自己的眼见耳闻追述的信史。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土地庙不是王道士所修，五尊残塑中所出经卷也不是王道士藏纳的。当然这宗遗书也就不是藏经洞散出之物。

至于王道士在藏经洞劫余经卷运京之前曾窃藏一部分另行存放，倒是确有其事的。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学部致函陕甘总督，令敦煌知县陈泽藩点查剩余经卷，全部运到了北京，存于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1912年2月1日，日本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用三百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骗去169卷写经，二月三日又用五十两银子向王道士骗买200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也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600多卷。这三次骗买九百多卷写经，都是发生在官府点验余卷并全部运京之后发生的，这就充分证明王道士事先的确窃藏了一部分经卷。难怪敦煌人士谣传纷纷。1944年，阎文儒先生在敦煌时还听到“从前千佛洞管理藏经理事会某会董说：现在由王道士所建的千相塔、塔心刹柱，缠有经卷许多”。连阎先生也抱有一线希望，“如能发掘该塔，或者更可能有大批卷子的发现”

（同前引阎先生文）。196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拆除千相塔，考古学家宿白和几位建筑专家均在现场，结果并没有发现一片藏经。王道士知道这些残头少尾的破烂经卷比白花花银子更贵重，怎舍得白

白地埋弃地下？

三从土地庙遗书的特点，推测这批卷子的入藏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刘忠贵，施涛涛所编《目录》载明土地庙遗书中有五件可据题记知为北魏写经，其余各卷，就纸质、书法和行字规格而论，也全系北朝写卷。早年苏莹辉先生皆断为“六朝”写卷，其上限虽未免过泛，而下限在唐以前则是信而有征的。

我们把土地庙遗书同藏经洞遗书加以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如下几点差异：

1. 时代：藏经洞遗书的时代，上起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譬喻经》（日本中村不折藏），下迄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残历日》（见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上下跨越八百余年；而土地庙遗书上起北魏，下至隋代，写卷时间上下不过二百年。

2. 版本：藏经洞遗书除大量写本外，且有印本历日、佛像、韵书和拓本碑帖等；而土地庙遗书全为写本，无一印本或拓本。

3. 文字：藏经洞遗书除大量汉文遗书外，又有不少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遗书，如梵文、康居文、于田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吐蕃文等；而土地庙遗书全为汉文遗书。

4. 装帧：藏经洞遗书除大量卷轴本外，尚有单页、折页、册页、蝴蝶页等多种形式；而土地庙遗书只有卷轴本及其短小规格的单页式。

5. 宗教种类：藏经洞遗书除了大量佛教典籍外，尚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经；而土地庙遗书仅有佛教典籍。

6. 收藏：藏经洞遗书有不少盖有三界寺、净土寺、报恩寺、开元

寺、乾明寺等寺院藏经印；而土地庙遗书无一加盖上述藏经印者。

7. 古佚：藏经洞有三百多种古佚佛经。这些古佚经有两种情况，一为时代较早，多属唐以前物；二为敦煌地方高僧的讲疏和僧徒听经手记之类。土地庙遗书，数量虽仅占藏经洞遗书的五百分之一，而内容却又有超出藏经洞范围者，如：敦0010号《佛说祝毒经》、敦0018号《佛说阿难律经》、敦0037号《佛说悔过经》、敦0044号《~~摩~~婆沙论中阴处》、敦0045《旧杂譬喻经》等，都是藏经洞未备的佚品。其中《佛说祝毒经》、《佛说阿难律经》，现行《~~石~~砂藏》、《大正藏》均未收录。

通过上边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土地庙遗书具有许多区别于藏经洞遗书的特点。这些特点，透露出它不同于藏经洞遗书的独立体系、源流和归属：

1. 从年代上看，土地庙遗书都是唐以前的早期写本，不像藏经洞遗书有大量唐代、吐蕃时代、五代、北宋写本。学者们根据藏经洞遗书年代的下限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代为北宋前期，我们则根据土地庙遗书的下限推断其收藏时限不晚于隋代，早于藏经洞遗书封存时限四百多年。

2. 土地庙遗书中没有道教、景教、摩尼教经典，意味着这批遗书收藏之日，道教、摩尼教、景教在敦煌尚未盛行，至少表明北朝时期莫高窟作为佛教圣地的纯粹性质。到了唐代，尤其是中唐以来，莫高窟既是佛教圣地，又是敦煌学問的渊藪和文化荟萃的学府。所以藏经

洞遗书竟是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以及汉文番字一应俱全，而土地庙遗书品种单调、范围局限，也表明它的收藏时代较早。

3.土地庙遗书中无一印本、拓本，装帧形式单一化，表明其时拓印、印刷和装帧事业尚未发达，或者至少表明印刷及新的装帧技术尚未传到敦煌。这也透露出土地庙遗书收藏时代较早的一个侧面。

4.土地庙遗书中没有一件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这一现象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表明收藏之时西域语文尚未流行，识者不多，甚至某些古代少数民族尚未创造自己的文字；二是表明这部分遗书收藏者不懂西域文字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换句话说，收藏者可能是汉人。

5.土地庙遗书中的古佚经超出藏经洞所藏古佚经的范围，甚至是古代佛藏失载的佛经。如《佛说祝毒经》、《佛说阿难律经》等，藏经洞出土的，成书于刘宋时代的《众经别录》和流行本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佛经目录学著作中都不见记载。可能表明这些古佚经的译述和流行时代更早。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它同藏经洞遗书分属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源流，它不属于藏经洞遗书系统。

6.土地庙遗书收藏年代与土地庙塑像塑造年代的矛盾意味着什么前已推断土地庙遗书的入藏年代不晚于隋，而其所藏之处的五尊残塑却是清代所造。遗书的入藏年代同藏纳遗书之物的修造年代悬隔

千年，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

笔者认为，二者的矛盾不是排斥性的关系，而是互相制约的一种存在形式，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统一的。这批写卷尽管原收藏和原封藏时代都很早，但若后来，譬如明清时代被发掘出来，就有可能被二次藏入新造塑像之中。

这种可能并非出于想当然，而有一定事实背景作根据。

原封藏之后来被发现，至少存在两个契机，一是自然作用的结果，原藏之所（如洞窟、佛塔或塑像）年久毁坏，经卷即可随之出世，二是人为作用的结果，比如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敦煌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人占领，莫高窟洞窟受到很大破坏，道光本《敦煌县志》载“明时回人蹂躏，佛像零遭毁坏”。所藏经卷即有随之出世的可能。事实上，我们也发现过藏卷在明代或清初出世的一些蛛丝马迹。

第一个迹像，S 1720号《大乘无量寿经》从书法、纸张、行字看应是五代以前写本，背面有题记云：“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十一字。洪化为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年号，总共不满三年。此云洪化四年冬月季乃是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一月末。大约是吴世璠的部下，在兵败覆灭后逃亡至此，得此写卷诵读并加题识。之所以仍书为洪化四年者，盖此时敦煌尚在吐鲁番统治之下，无年号可记

（清廷在康熙五十四年始领有敦煌之地），而题识者仍以大明遗民自居故仍用洪化纪念，这件遗书，显然不是后来在1900年方始出世的

藏经洞之物，而有可能是明代从莫高窟某一封藏中出土的物品。

第二个迹象，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经卷，除直接出自土地庙残塑、佛塔、窟前遗址者外，还有一些是解放后零星收集到的。其中有些卷子，经过勘比与土地庙所出遗书同为一卷。这种情况笔者统计有20卷之多，列表如下：

卷名	土地庙出土品	零星收集品	说明
婆沙论卷第十四·中阴处第四十一	0044	0321	为同一写卷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九 入法界品第二十四之十六	0063	0308	为同一写卷
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三·释初品中到彼岸义第五十	0052	0171, 0224, 0264	为同一写卷
中论卷第二·观行品第十三	0013 0014, 0015	0124	
维摩诘经疏禅	0066 0067	0247, 0248, 0249, 0250, 0251, 0252	为同一写卷

（表中著录之号，皆系《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之编号）

敦煌文物研究所多数同志认为，这部分零星收得而与土地庙出土品适为同一写卷者，乃是1944年土地庙藏经出土之初流散出去的，这一看法的根据是，据说当年这批遗书出土之后，未运到研究所办公室之前，有人私藏了一些，于是流散在敦煌。这种说法有一定根据。

但是，零星收集所得的卷子中，有一些是无头无尾断残特甚的破纸烂片，如0247、0248、0249、0250、0251、0252等号即是如此。偷取私藏这样断残破烂的卷子而放弃较为完整长大的卷子不取，懂行的不会如此，不懂行的人更不会如此。

笔者认为，这些断残不堪的卷子不一定是窃藏者攫取之物。它有可能是这宗遗书原藏的一部分。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这部分卷子，明代或清代曾经出土，一部散失于民间，其中若干卷后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零星收得；另一部分被和尚喇嘛作为‘装胜’之物纳入塑像腹中即后来从土地庙残塑中发现者。这两部分遗书始为同源同体，继而断裂分散，最后聚而合一自然是情理中事，不必皆同出于土地庙才可能散而复合。

第三个迹象，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的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西夏文、蒙古文遗书，汉文遗书中也有元代写本。这些遗书卷子，既非出自藏经洞，又非出自土地庙。它的年代晚于藏经洞藏品的下限（北宋）而早于藏经洞和土地庙藏品被发现之日。这部分遗书，除近、现代发现者外，其余也应当是明代或清初出土之物②。

上述三种迹象，都表明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已可能有批量遗书出土。唯因缺乏记载，难以推知出土的具体时间及数量。

1948年1月，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清除窟前积沙，新发现一窟。编号为53窟。1952年本所职工清除53窟内积沙，又在此窟北壁距地面约一米高处发现封门裂缝，拆开封门，又发现一窟，

编号469窟。此窟坐北朝南，形制大小、所处方位以及距主窟室地面高度等，都同藏经洞（十七窟）相仿佛。窟内除甬道两侧各画一菩萨像之外，窟内既无塑像也无壁画，只是在北、南、西三壁之中部各开一顶帐形小龕，龕内各横置木同架一层，显然为存放物品之橱龕。其西壁橱龕南侧，有墨书题记三行，文曰：

广顺三年岁次癸丑八月十五日

府主太保就窟上造貳千仁（人）

（斋）藏内记

题记表明广顺三年（公元653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在莫高窟举办两千人的大规模法事斋会，斋会转读的经卷存藏于此。这样，我们便清楚地知道此窟内三个橱龕原是存放经卷的处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打开这座窟室时，其中已空无所有。可能是临时存放，后又取走，但也不排除此窟为储经专室的可能性，至少可以肯定此窟曾经作过藏经室。会不会有类似的藏经室被后人打开过呢？这恐怕又是一个待证的未知课题了。但是，我们深信，千余年来莫高窟藏经之举非止一次藏经之所非止一处，藏经的发现也不仅仅是1900年藏经洞和1944年土地庙两起，而且今后会不会续有发现，人们对此不能不抱有希望。

注译：

①常书鸿检验报告全文如下：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发现藏经初步

检验报告。

本所因修建职员宿舍，於八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在后园土地祠（该庙为清末中寺主持王喇嘛所修）残塑中发现六朝残经多卷，当经鸿召集全体职员并邀请现正在千佛洞之西北考察团考古组向达、夏鼐、阎文儒三先生参加检验，详细记录。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掇涂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现经匆促编造初次查验目录。该项残页现妥存本所。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於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国文化之幸也。

常书鸿谨志于莫高窟

三十三年九月一日

参加检验本研究所职员：常书鸿 张琳英 刘荣曾 李浴
陈延儒 苏莹辉 邵芳 陈芝秀 董希文 辛普德

监验人：向达 夏鼐 阎文儒

记录：苏莹辉 李浴 刘荣曾

②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池田温教授1987年撰

《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一文。旋将其中文